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传播政治化的比较研究

顾超

摘要:中美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都出现了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现象,但其特征及产生机理有着深刻差异。采用“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抗击“信息流行病”和设置病毒起源框架三组典型案例,比较了中美两国科学传播政治化的共性和差异。中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科学传播基于“缺失模型”;美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科学传播基于不完善的“公众参与科学”。不同科学传播模式与政治传播模式的结合,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两国的科学传播政治化呈现出不同特征的主要原因。在疫情中,科学传播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要明确科学与政治的边界,重视政治沟通,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将科学传播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关键词:科学传播;政治传播;科学传播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3-0042-09

项目基金:中国科协科技治理年度报告课题(20200608CG11020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此次疫情不仅是一个医学或流行病学问题,还是对重大公共危机的综合社会治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对重大公共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科学,也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国外对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的污名化、国内的“双黄连事件”等,都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和负面社会影响。这些典型案例从反面彰显了科学传播在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在此次疫情中,科学与政治的边界模糊不清,科学传播与政治传播合而为一。一般而言,科学传播具有政治属性,科学传播的政治化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次疫情中科学传播的过度政治化,会催化“信息流行病”的产生和蔓延,阻碍疫情防控,危及人们的生命健康,损害社会治理体系,破坏国际合作,对人类社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本文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审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中美两国在此次疫情中科学传播政治化的主要特征和产生机理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科学传播的政治化

(一) 科学的政治化趋势

科学与政治之间始终具有张力。一方面,科学需要政治的支持。20世纪以来的现代科学出现了某些特点:科学与技术融合为一体,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质支撑,出现了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大科学”。特别是国家的科技政策对该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从而导致政治对科学的影响大为增强。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功能的外显,科学逐步成为有政治渗入其中的社会建制化事业。也就是说,社会建制的科学化必然是科学的政治化。如果政治对科学的影响过大,以致科学丧失足够的自主性,无疑有害于科学。历史上纳粹的“反相对论公司”,李森科的社会主义生物学,中国“文革”时期对科学的全面专政等等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1]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的研究表明,科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政治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因此科学被纳入社

会网络中时,它便具有了政治的属性。^[2]科学不但是政治化的,而且还将不断地再政治化。但如果因此走向另一极端,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政治,则消解了科学与政治的边界,会导致科学中“政治的泛滥”和权力的滥用。Pielke 也认为,科学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发展到呈现出病态的极端。^[3]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4]不一定是政治的制度、场所或对象,但可能具有政治根源、影响或效应,因此具有政治性。在当代美国,围绕科学议题和相关技术的讨论常常被政治主导,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美国的保守力量长期以来拒绝接受全球变暖的科学结论^[5],而多年来的研究也表明,美国自由派中相信气候变化者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保守派。在气候变化被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否认全球变暖的团体充分利用人们的各种心理认知机制来降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可。他们试图将气候变化描述成一个政策议题而不是科学议题^[6],导致人们在试图了解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政治经济信息而不是科学信息来做出判断。他们也试图营造出一种氛围,即科学家远未就气候变化达成一致意见,气候变化仍然存在很大争议。美国社会在进化论、胚胎干细胞、各种疫苗和核能的使用等其他科学争议议题上观点的极端化倾向,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二)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

科学在欧美社会不断被政治化,是科学传播研究转向与政治传播融合的重要原因。为了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有两个核心概念首先需要界定清楚。

第一,什么是政治传播?以政治学的视角看,政治传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大众传播学意义上的政治沟通,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民意的形成、舆论的导向、政治态度的变迁等等;另一个是信息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政治沟通,研究在国家这个政治系统里政治信息是怎么流通的。^[7]以传播学的视角看,政治传播是政治主体通过媒介将政治信息进行传递,使受众接受并反馈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活动。^[8]结合二者,本文将政治传播界定为特定政治共同体中,与政治有关的信息的流通、扩散与民意和舆论的形成过程。政治传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传播政治信息、设置政治议题、影响公共舆论、促进民主、政治社会化、塑造政治形象、监督政府、政治控制与稳定。^[9]政治传播的形式主要有:一类是传播形态,主要包括政治新闻和政治宣传;一类是传播符号,主要包括政治修辞、政治象征和政治形象。^[10]

第二,什么是科学传播的政治化?西方学者认为,当追求政治目标的行动者在战略上使用科学发现或科学知识的含糊不清来支持或反对特定的政治结果时,相关的科学问题就被政治化了。^[11]由此政治化的科学辩论可以被界定为科学家和非科学的行动者对科学研究状况及其政治影响的公共争议展开辩论。Scheufele 进一步指出,现代科学的公众传播内在地就是政治的。^[12]科学传播从强调以教育“缺乏知识”的公众为手段的“缺失模型”,发展到强调科学界与公众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但这两个模型都假定科学与公众的互动发生在社会政治的真空中,没有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政治领域中如何为获得关注而竞争,或者公众如何应对相互矛盾的信息流。因此,有必要建立第三个模型:“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这个模型强调公众直接参与科学是非常少的,多数情况下科学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公众对现实的理解和认知,而是在特点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通过媒介转化为“中介现实”,再传播给公众。由此,传播学领域中的议程设置、新闻框架、启动效应、沉默的螺旋等经典范式都可以用来分析“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本文将采用“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这一模型,对中美两国在此次疫情中科学传播的政治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

二、疫情中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特点比较

此次疫情暴发一年来,中美两国在科学传播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两国最主要的共性,就是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程度较高,很好地符合“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模型;两国最主要的差异,则是科学传播政治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下面从三个不同的方面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

(一)应对重大公共危机

政治传播是人类有组织地应对危机事件的重要手段,是国家重大疫情防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对于疫情发展情况和防控知识的宣传普及,需要政府全面整合信息资源,及时且有策略地发布相关信息。信息上传下达的方式和渠道影响着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除此之外,人们需要通过传播来沟通情感,消除恐慌,提高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应对疫情的信心。因此,为了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科学传播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也需要在某些方面发挥政治传播的功效。

在现实中,中国与美国都采用“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来应对疫情造成的重大公共危机,但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应对危机的典型做法,是由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首次肯定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钟南山当时的身份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由这样一位科学家在中央媒体上宣布一个科学发现,实际传递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科学判断不仅对全国公众做了预警,提示了病毒人际传播的危险性,提出了出行限制、戴口罩等初步措施,更重要的是为几天后武汉封城的决定以及其他各种应急响应措施提供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科学传播在这里充当了政治传播的角色,为应对公共危机的政策合法性提供了关键支撑。在这个案例中有一个特殊人物值得深入思考,就是为什么由钟南山来宣告这一信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科学家同时兼任专家组组长来宣布一个科学判断,传播效果好于其他人——比如国家卫健委或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病毒是否“人传人”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应由科学家来判断。而由科学家来宣布这一判断,既强化了对科学性的认证,也让科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把这一判断定义为科学判断,避免因科学的不确定性带来其他政治后果。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钟南山本人具有很高的权威。他既是著名的院士专家,也因作为抗击 SARS 的功臣而早为全国人民熟知。主要由于这一次“敢言”,后来钟南山被主流媒体盛赞为人民英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科学传播的良好效果:中国公众对科学家高度信任^[13],对依靠科学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在应对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危机时,美国的科学传播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特朗普总统亲自上阵发表关于病毒起源、疫情严重程度、特效药、疫苗等与科学有关的言论就不计其数,科学家往往只能起到辅助、修正的作用。典型的案例是在美国疫情暴发初期,当特朗普在3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到一个阴谋论时,福奇捂住了自己的脸,甚至成了互联网上的表情包。福奇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知名流行病学家,也是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的关键成员。他先后服务过6任美国总统,2008年获得“总统自由勋章”。福奇在接受 Science 杂志采访时说:“我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不认同。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说法,和我平时的说法不大一样。发布会的说法会导致一些误解,歪曲一些事实。”^[14]福奇直言新闻发布会将导致误解和歪曲事实,这是在明确否定这次科学传播的效果。不仅如此,当特朗普称抗疟疾药物氯喹和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早期试验结果“非常令人鼓舞”时,福奇表示,“没有有力证据”显示其可以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特朗普表示距离新冠肺炎疫苗面世已很接近,而福奇一直称,疫苗大规模应用很可能要“一年至一年半时间”;白宫坚称新冠检测试剂盒充足,但福奇坦言“美国目前的检测能力尚不能满足需求”。^[15]

中美的这两个案例是非常相似的:科学传播都高度政治化,科学家的“敢言”“直言”在很大程度上都履行了政治功能。差异也很明显:在中国,钟南山既是科学传播的主体,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在应对危机时,“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体现了政治与科学的共赢策略:科学权威为政治合法性提供支持,政治权威给予科学权威更高的荣誉和地位。这种策略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美国,福奇作为科学传播的主体之一,只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作为政治符号,由于福奇与特朗普貌合神离,特别是“表情包”经网络放大后,科学传播所发挥的政治传播功效,主要是“让科学背锅”、加剧政治极化,而不是让公众信任科学、增强社会凝聚力。

(二) 抗击“信息流行病”

关于此次疫情的“信息流行病”^[16]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如 WHO 总干事谭德塞所说,我们不仅在与疫情战斗,还与“信息流行病”战斗。^[17]各种虚假、错误、低质量信息的大范围传播,不仅威胁人们的健康与安全,还会妨碍决策、制造混乱、传递恐慌,造成严重的社会治理困境。

中美两国在抗击“信息流行病”时也体现出科学传播政治化的倾向。中国的典型案例是“双黄连事件”。1月31日夜闻,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则“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闻^[18],引发群众连夜到药店排队抢购双黄连药品的狂潮。此后网络上开始辟谣,《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很快澄清,“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理,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但此事件已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宣布发现一种药物可抑制新冠肺炎病毒,这本是普通的科学传播。但在疫情暴发造成巨大社会恐慌之时,由官方权威媒体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一发现,普通公众没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去分辨“抑制”和“治疗”,“体外实验”和“临床疗效”之间的区别。媒体不完善的“解码”导致公众对科学信息的误读,进而引发全社会的轩然大波。科学传播由此转化为政治传播,造成了社会混乱,产生负面的政治影响。

美国的典型案例是针对比尔·盖茨的阴谋论。YouGov的一项调查发现,大约28%的美国人和50%的福克斯新闻观众认为,比尔·盖茨正计划使用疫苗在人群中植入微芯片。^[19]在2月至4月期间,电视或社交媒体上错误地将盖茨与新冠肺炎病毒联系起来的阴谋论被提及120万次,大部分内容被发布到Facebook网站的公共群组并被分享了数百万次。^[20]盖茨的先见之明和善举在传播领域被严重地污名化,并被美国国内诸如反疫苗运动等政治团体、政治运动所利用。

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引起的“信息流行病”时都没有很好地发挥科学传播的作用。相反,科学传播的政治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信息流行病”的催化剂。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媒介的作用。中国是官方媒体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由于中国的官方媒体具有高度的政治权威,在这次科学传播中代替了科学共同体的主体地位,进而在科学素养不足的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政治影响;美国针对盖茨的阴谋论主要是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信息数量大、即时化、碎片化,导致反智主义的虚假信息泛滥,同时一些政治团体也对阴谋论的发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设置信息框架

新冠肺炎病毒的溯源本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但已通过设置信息框架的方式在高度政治化的科学传播中引发了较强的框架效应。研究表明,当暴露于信息框架导致人们在形成信念时优先考虑框架强调的因素时,就会出现框架效应。^[21]疫情中最重要的一种框架设置就是指称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个病毒实验室,是由人工制造的,有意或因事故而泄露出来的。甚至有的说法认为新冠肺炎病毒是病毒武器。

虽谣言未必源自美国,但这种关于病毒起源的框架设置主要在美国流行,并且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Bolsen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暴露于有关病毒起源的框架信息中,可以对人们关于病毒起源的信念产生强大的影响。^[22]更重要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信念有强烈的框架效应,使受到影响的人们认为病毒可能是由中国政府创造的,以致产生惩罚中国的意愿。相反,那些相信这种病毒来源于自然的人,更支持拨付生物学领域的额外资金以资助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暴露于病毒起源的框架中还会导致一种社会效应,即不支持科学防御新冠肺炎疫情的个人行为,例如戴口罩、经常洗手、维持必要的社交距离等。由此可见,这一框架设置在美国国内实际是有碍疫情防控的,但支持了“甩锅中国”“惩罚中国”的政治主张,在国内起到了政治社会化的作用,对国际政治也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针对美国设置的新冠肺炎病毒起源框架,中国的应对不多。在国务院新闻办2020年6月7日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宣称:新冠肺炎病毒是人类未知的新病毒,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需要科学家和医学专家进行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结论。通过转嫁责任掩盖自身问题,既不负责任也不道德,中国绝不接受任何滥诉和索赔要求。这一反应是正当的,但强有力的回应仍显不足。鉴于对病毒溯源的研究工作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不能局限在一些政治话语的外交回应,必须设置“反框架”,建构一套基于科学基础之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中美两国在信息框架设置中的地位是不对称的。美国主动设置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的议题和框架,使得“惩罚中国”的政治主张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用反科学的科

学传播助力政治传播。中国则在被动应对美国设置的框架,试图用政治传播解套,但缺乏有效的科学传播。特别是针对国际社会的科学传播,没有做好设置“反框架”的准备。

三、疫情中科学传播政治化的产生机理比较

从上述三组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此次疫情中的科学传播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但“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其产生机理值得深入探索。

(一) 政治传播与科学传播的结合

1. 中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科学传播基于“缺失模型”

荆学民等认为,政治宣传就是通过意识形态不断地建构和维护特定政治的合法性。^[23]政治宣传具有议题突出、政治信息自上而下单向流动、政治动员机制强化等特质,这种活动之中隐含着“政治宣传主体”在政治系统中对政治信息的管控,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宣传主体与宣传对象有界限分明的“主—客”之分。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就是意识形态通过持续而强大的政治传播过程成为政治场域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思维方式、话语路径和叙事框架。中国的政治传播有从单一的政治宣传向注重反馈和对话协商的政治沟通转变的总体趋势,但在应对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危机时,仍是以政治宣传为主。

贾鹤鹏等指出,相比欧美国家,中国科学传播活动的主体形式仍然是建立在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基础上的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24]“缺失模型”认为科学家是拥有知识的专家,公众是无知的外行,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正是由于他们对相关科学知识的无知。^[25]因此,科学传播的关键任务是由专家向公众单向度地普及科学知识,教导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从而赢得他们对科学的支持。“缺失模型”把公众视为同质的集合体,需要统一的科学教育,认为随着公众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就会越来越支持科学,忽视了公众已有的科学或其他方面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影响沟通的方式。事实上,公众可能已经理解了科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认同那种科学^[26],或者并没有采取与那种科学相一致的行为。

中国的“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是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与基于“缺失模型”的科学传播的某种结合。在钟南山的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宣传主体对政治信息的管控。钟南山英雄形象的树立,不仅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更是对作为宣传客体的公众的一次成功的政治宣传。科学为维护政治合法性和抗疫的政治动员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在此案例中,科学信息的传播是单向度的,只有科学家对信息的发布,并没有公众的参与、讨论、对话、协商。由于疫情暴发时,最重要的是做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让公众在最短时间理解科学,以最高的效率动员公众采取控制疫情的科学措施,因此此时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是正当的、合理的。

然而,在“双黄连事件”中,官方媒体之所以能够打破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并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主要原因就在于无论科学传播还是政治传播,都是以自上而下的单向度传播为主。政治宣传缺乏政治沟通所展现的沟通主体与沟通对象之间政治信息流动的“反馈互动”机制,“缺失模型”排斥公众参与科学及公众与科学家对话协商的机制。二者结合,再加上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严重缺位,是催生这一事件的主因。显然,在网络时代,缺乏政治沟通的政治宣传容易引发“越界”的副作用,而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阶段之后,以单向度发布信息为主要手段的“缺失模型”无法长期有效地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应急响应不能替代科学传播的长效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科学、促进公众与科学界的对话已势在必行。

在应对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的框架设置时,中国只有政治外交话语,科学共同体的参与不足,缺少主体性,更谈不上公众的参与、反馈、协商、互动。因此,在这个案例中,政治传播与科学传播结合得不太成功,中国在建构“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方面有待改进,关键是要让科学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中发声,立足科学证据,运用科学话语,做好国际科学传播。

2. 美国的政治传播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科学传播基于不完善的“公众参与科学”

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的政治传播,政治基于竞争,传播关系基于“主—客”二分。^[23]这种政治传播对于政治共同体合法性的建构和维系,依赖于现有政治价值的交换和交易,以及对未来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承诺。其运行过程中,资本和媒介越来越成为权重最大的变量。美国的政党政治决定了其政治传播以政治营销为核心,赢得政治竞选是根本目的,资本和媒介是主要的驱动力。

在理论范式上,美国的科学传播在近年来有根本的转型,以教育“缺乏知识”的公众为手段的“缺失模型”逐渐被强调科学界与公众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取代。然而在实践中,“公众参与科学”的模式并不完善。一方面,总体而言,公众参与科学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科学”没有充分考虑利益攸关者,从而忽视了这类活动的政治属性,即它们本质上是各种利益的竞争、对话与妥协。因而在现实中,某些类型或群体的“公众参与科学”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变得极端化。

美国的“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是以政治营销为核心的政治传播与基于不完善的“公众参与科学”的科学传播的某种结合。这种传播造成的一个典型后果就是政治极化。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党派的美人在疫情中对政府反应的看法、对限制个人行动的支持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例如,8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对疫情的反应是好或者很好,而只有18%的民主党人这样认为。^[27]与民主党人相比,更少的共和党人认为社会距离对减缓新冠肺炎病毒传播有很大帮助,需要更多的人遵循社会距离准则。政客和媒体在放大此次疫情的政治化和两极分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闻报道会以加剧党派分歧的方式影响公众态度。

在福奇的案例中,福奇基本坚守了一位科学家的底线,在与总统尽量不发生正面冲突的前提下,努力在科学传播中纠偏,发出科学、理性的声音。然而,这种努力产生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赢得总统选举是特朗普压倒一切的目的,他所做的科学传播都是出于政党政治的考虑,与福奇之间必然存在张力。有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新闻报道可以影响公众观点,鼓励个人追随政治精英而不是专家。^[22]在媒体报道高度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时期,关于疫情的舆论也高度分化。

在比尔·盖茨的案例中,阴谋论主要是由社交媒体自下而上的力量促成的,这与中国“双黄连事件”中官方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反疫苗运动等政治团体和政治运动在此案中的影响,也是美国民主政治民粹化的表现。不完善的“公众参与科学”,也对阴谋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众确实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对科学问题表达意见而参与了科学,如阅读和转发社交媒体上的观点,但其并未与真正的科学共同体进行对话、协商,而是被媒体和政治团体裹挟在信息的洪流中。

设置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的框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美国国内抗疫不力的原因归罪于中国,改变选民的科学认知,进而影响其政治态度。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暴发之初,右翼媒体更容易传播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更频繁地观看保守媒体的观众更容易误信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27]框架效应在美国国内是有明显作用的,在国际社会也获得了一些响应,这也是用政治营销拉拢支持者的典型做法。

(二) 意识形态的自我强化

除了不同模式的政治传播与科学传播相结合,中美两国科学传播政治化具有深刻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正如赵鼎新所指出的,信息的背后是否有一个该信息的主要受众所共享的宏大价值观的支持。^[28]如果不真实信息背后有某种宏大价值观支撑,该信息就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大谎,因为相信这套价值观的人,或者对该信息的真假不在乎,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分辨能力。即使对于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对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不真实信息也更容易采取体谅的态度。美国背后有一套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支持,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国家民众,对这套话语体系仍然有很强的认同。同时,在美国公众看来,总统的言论也只是美国的一种声音,而不是全部声音。特朗普的言论不仅被福奇偷笑,更受到美国反对党领袖、许多主流媒体及各界人士的公开反对。正因如此,尽管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严重,其政治体制仍然是稳定的。这套意识形态既然管用,就会产生自我强化效应,让美国的政治精英屡试不爽。在科学传播领域,美国的政客更可以不顾

科学事实,根据政治利益的需要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媒体和资本也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

比较而言,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抗击疫情,靠的也是党的领导。科学传播围绕这一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宣传,在疫情暴发期进行紧急动员,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前文已经分析过钟南山的案例,即是明证。这一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自我强化,帮助中国取得疫情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和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但如果在科学传播领域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忽视了科学共同体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性,也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如“双黄连事件”不仅体现了公众的科学素养不足,也凸显了公众对官方媒体的政治宣传的过度响应。一旦政治宣传出现某些问题,会严重损害公共权威的政治公信力。再如应对病毒起源框架,外交部发言人3月份时曾发布了多条推特,要求美国解释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怀疑病毒是否可能由美军在世界军人运动会时带入中国武汉。^[28]这一“反框架”在国际社会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主要原因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不太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普遍认同;二是这种“反框架”只是政治话语反击,缺乏科学话语的有力支撑。

四、对策建议

比较中美两国在此次疫情中的科学传播可以发现,由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等方面相似的需求和境遇,两国都出现了科学传播政治化的现象。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两国的科学传播与政治传播的核心理念与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两国的科学传播政治化模式也大相径庭。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此次疫情防控的阶段性特点,本文对中国“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明确科学与政治的边界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试图让科学传播完全去政治化是乌托邦,因为公共领域内的科学传播必定会涉及政治议题,产生政治影响,发挥政治作用。虽然科学传播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但要让科学传播对社会产生正面作用,就不能简单地将科学与政治混为一谈,或者只讲政治不讲科学、只有政治传播没有科学传播。要让科学的归科学,恺撒的归恺撒,明确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同时,“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本质上还是科学传播,应以科学为本,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作为最基本的原则。

(二)重视政治沟通

政治沟通立足于民主运行理念和多元政治诉求,展现的是沟通主体与沟通对象之间政治信息流动的“反馈互动”机制。相比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更注重政治运行中政治信息输出后的结果,注重传者与受者通过政治信息“解码”后所达成的共识。为实现信息的良性循环,达到科学传播与政治传播协调互济的效果,单一的政治宣传是不够的。“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应高度重视政治沟通的作用,将国家主导的政治宣传与社会性、公共性、互动性的政治沟通相结合,关注公众的反馈,强调传播的公开性、双向性、间接性、渗透性和柔性^[29],更好地实现政治社会化。

(三)促进公众参与科学

在面对此次疫情时,单向度、灌输式的科学传播缺失模型近乎完全失灵。尽管“公众参与科学”并不完美,但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尤其是面对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危机时,推动公众参与科学是当务之急。如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等热点问题,可以尝试举办科学共识会议、科学传播论坛等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活动,引导科学共同体在公共领域中敢于发声、善于发声,促进公众积极参与科学,探索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协商对话的制度化途径。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出现类似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民粹化现象,保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共识得以最大化。

(四) 将科学传播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在疫情中,“作为政治传播的科学传播”是科学传播的基本模式,科学传播不仅关涉科学问题,更会对整个政治共同体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科学传播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搭建从国家政治中枢到基层神经末梢的双向传播架构^[30],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保证传播的广泛性和信息的完整性。在治理主体方面,突出科学共同体的主体性和公众参与的程度;在治理向度方面,注重双向性和交互性,特别要重视自下而上的反馈;在权威性质方面,既要能够高效地强制动员,也要认真协商对话;在作用所及的范围方面,应渗透到整个公共领域。

参考文献:

- [1] 李醒民. 科学与政治刍议. 学术界, 2013, 12: 108-130.
- [2] 李正风. 科学政治化与科学的民主化——评《民主政治中的科学: 专业知识、制度与代表》. 科学与社会, 2015, 4: 115-118.
- [3] R. A. Pielke. *The Honest Broker: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in Polic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 137.
- [4] M. B. Brown. *Politicizing Science: Conceptions of Polit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5, 45(1): 3-30.
- [5] A. M. McCright, R. E. Dunlap. The Politic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s Views of Global Warming, 2001-2010.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1, 52(2): 155-194.
- [6] 贾鹤鹏, 刘立, 王大鹏等. 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 *科学学研究*, 2015, 3: 330-336.
- [7] 俞可平. 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 9: 73-74.
- [8] 荆学民, 施惠玲. 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 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9, 4: 18-22.
- [9] 李元书. 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78-347, 41.
- [10] 张晓峰, 赵鸿燕. 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145-256.
- [11] S. Post, N. Ramirez. Politicized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edicting Scientists' Acceptance of Overstatements by Their Knowledge Certainty, Media Perceptions, and Presumed Media Effec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8, 95(4): 1150-1170.
- [12] D. A. Scheufele.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4): 13585-13592.
- [13] 王新. 新时代·新态势·新思考——第二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侧记. *中国科学报*, 2020-06-18. [2020-12-06]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6/355952.shtm>.
- [14] J. Cohen. *Fauci's Straight Talk*. *Science*, 2020, 367(6485): 1414.
- [15] 谭晶晶. 安东尼·福奇: 直言不讳的美国抗疫专家. [2020-12-06]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8/c_1125917165.htm.
- [16] R. Gallotti, F. Valle, N. Castaldo, et al. Assessing the Risks of 'Infodemics' in Response to COVID-19 Epidemic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0, 4(12): 1285-1293.
- [17] J. Zarocostas. How to Fight an Infodemic. *The Lancet*, 2020, 395(10225): 676.
- [18] 刘健, 严定友. 科学传播的边界问题: 从普及科学到建构科学公共领域——武汉抗疫期间“双黄连事件”引发的思考. *华中学术*, 2020, 31: 211-222.
- [19] S. van der Linden, J. Roozenbeek, J. Compton. Inoculating Against Fake News about COVID-19.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2928): 566790.
- [20] 陈思佳. 比尔·盖茨被污蔑为“新冠病毒制造者”: 为从疫苗中牟利. 2020-04-18. [2020-12-06]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4_18_547387.shtml.
- [21] J. N. Druckman. Political Preference Formation: Competition, Deliberation, and the (Ir) Relevance of Framing Effec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4, 98(4): 671-686.

- [22] T. Bolsen, R. Palm, J. T. Kingsland. Framing the Origins of COVID-19.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42(5):562-585.
- [23] 荆学民, 段锐. 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及运行模式.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 11:8-15.
- [24] H. Jia, L. Liu. Unbalanced Progress: the Hard Road from Science Popularisation to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in Chin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4, 23(1):32-37.
- [25] 孙秋芬, 周理乾. 走向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论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困境与知识分工的解决方案. *科学学研究*, 2018, 11:1921-1927.
- [26]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 有效的科学传播: 研究议程. 王大鹏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4.
- [27] P. S. Hart, S. Chinn, S. Soroka. Politic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COVID-19 News Coverage.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20, 42(5):679-697.
- [28] 赵鼎新. 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 *文化纵横*, 2020, 4, 69-77.
- [29] 荆学民, 苏颖.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2:79-95.
- [30] 荆学民, 宁志焱.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治传播作用的凸显. *中国编辑*. 2020, 8:36-4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Gu Chao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xperienced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are profound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SA in cases of responding to major public crises, fighting against the "infodemic" and framing the origins of COVID-19.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based on political propaganda whil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based on the "deficit model" in China. By contra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political marketing, whil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based on imperfect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ccordingly,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mod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distinct from that in USA. Moreover, discrepancy in ideology is also a salie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science communication cannot be completely depoliticized. As a result, it's vital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attach importance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incorporat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 收稿日期: 2021-01-11

■ 作者单位: 顾超,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北京 100871

■ 责任编辑: 汪晓清